

《歐美研究》第三十八卷第三期 (民國九十七年九月), 363-376
http://www.ea.sinica.edu.tw/euramerica/ch_index.php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再思生命書寫中的「脆弱主體」： 專號緒論*

紀元文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11529 台北市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E-mail: ywchi@sinica.edu.tw

二十世紀六〇年代的世界圖像面臨前所未有的巨大衝擊：戰後的休養生息已然蘊積強大的動能，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等面向鬱然勃發的新生力量，強力挑戰形塑二十世紀前半葉的「進步」與無限發展榮景的現代性 (modernity) 及其遺緒，在亞洲有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在歐洲有勢如野火燎原的新左派風潮與學生運動，在美洲爭取弱勢族裔權利的民權運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 (文楚安, 2000: 13, 37-41)。影響所及，二十世紀後半葉的西洋文學批評與論述產業打破各種學門之間的疆界與藩籬，力圖形塑眾聲喧譁、繁複多音的論述場域。幾經各種思潮之激盪衝擊，多元文化思維已然成爲主導當代人文與社會科學等學術場域的動能，映帶生發，開創嶄新的想像閱域。

面臨此種急遽之世變，文學思想領域如響斯應，因而產生質變

責任校對：張滌之

* 本文承蒙單德興教授提供寶貴意見，增益文學體制變遷延異之相關理論，使本文之立論較為周全縝密，謹申謝忱

與量變。就前者而言，各種學門之間的疆界與藩籬逐漸泯滅、消除與解構，往昔壁壘分明的科際之間的疆界與畛域消失，爲了因應許多新生的事物，跨學門的科技整合 (interdisciplinary)，乃至於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逐漸冒現；就後者而言，去中心化 (de-centering) 的結果釋放出多元論述的空間與能量，曩昔被壓抑、抹消的聲音，不管是曾遭斷舌的菲洛美拉 (Philomela) 抑或是殖民學舌的卡立班 (Caliban)，一夕之間皆奮力將心中之塊壘鬱結一吐爲快，夜鶯的婉轉啼聲與被損害、被侮辱階層的泣血控訴相繼發而爲聲，蔚爲特殊歷史情境下的質詰／反擊 (interrogate/write back)，亦爲重建文化位置 (positionality) 之努力。¹ 這種諧擬的論述交鋒不僅是出於內鑠思維辯證之寫照，亦爲學而得之的書寫／銘記姿態。誠如李有成教授於「生命書寫」研討會開幕致詞所言：「在後殖民與後現代的歷史情境下，弱勢族裔與婦女團體逐漸取得發言的位置與再現的空間」(2007b)。明乎此，不論是探根溯源的結構主義、探勘知識／權力系譜的後結構主義，抑或辨析語言與現實游離的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在在豐富吾人履勘文學／文化版圖的新視野。進入新的世紀，解構主義者已經著手綴集倫理議題，補益理論的盲點，做爲反思的起點。畢竟文學／文化的研究終究還須回歸人本身

¹ 在後殖民論述中，有關噤聲失語 (aphasia)、殖民學舌 (colonial mimicry) 之隱喻皆源自西洋經典作品。前者乃係指雅典國王潘狄昂 (Pandion) 的女兒菲洛美拉遭姊夫色雷斯 (Tharace) 國王臺留斯 (Tereus) 強暴，被割舌噤語，以防洩漏實情，嗣後其姊普洛克娜 (Procne) 爲其復仇，烹殺小王子以饗國王，姊妹旋逃逸，化爲夜鶯，事見奧維德《變形記》(Metamorphoses) (Ovid, 1971: Chap. VI, 459-673)。後者乃係指被殖民、被壓迫者習得教化後，對殖民者之反擊與質詰。按卡立班 (Caliban) 係莎士比亞《暴風雨》(The Tempest) 一劇中女巫希克瑞克斯 (Sycorax) 的兒子，半人半獸，形狀醜惡猥瑣。被放逐於孤島的米蘭國王普洛斯佩羅 (Prospero) 以魔法將其收服，當作奴隸，卡立班生性桀傲屢有反抗，詳見《暴風雨》(Shakespeare, 1961: I: ii; II: ii)。

的社會、倫理存在狀態。如同新古典主義名家波普 (Alexander Pope, 1688-1744) 於〈論人〉(“Essay on Man”) (1733) 一詩中所言：「瞭解你自身，毋僭妄審視上帝；／妥適的人類研究還是人本身」(1951: 138)。²

在西洋文學遞嬗變遷的進程中，生命書寫向為廣受歡迎之敘事文體，不論是歐陸淵遠流長的個人自白傳統 (聖奧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 與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的《懺悔錄》(*Confessions*, 1770, 1782)、華滋沃斯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的精神自傳《詩序》(*The Prelude*, 1799)，抑或巴特 (Roland Barthes, 1915-1980) 自我剖析的文化批評回憶錄 (*Roland Barthes by Roland Barthes*, 1977)，皆為重新發現自我之傑作。此外，歐洲清教徒移民新大陸的殖民墾荒日記、講道詞，革命建國元勳的自傳，新英格蘭作家的札記、隨筆，內戰前後常見的黑奴自述，乃至於弱勢族裔因移民的「美國夢」碎，而以血淚寫就的回憶錄等等，其內涵與議題，莫不契合新世界的地理空間，儼然自成脈絡。凡此皆為彌足珍貴之文化資產，實為深入瞭解西洋文學精奧底蘊之重要參證文本。

上述提到若干西方回顧生命歷程的敘述傳統，然則相較於東方的文人、隱士常有自敘生平或是自我剖析之作品，西洋作家的自況之作似乎較不普及，比較常見的情形是由他人替作家立傳。倒是部

² 十八世紀英國的社會思想主軸高舉理性主義大纛，亦有理性年代 (the Age of Reason) 之謂，標榜人本主義之觀念與價值。波普所倡導的人性之研究，具有啟蒙 (enlightenment) 的意涵，肯定個人的主體性，以經驗實證論取代神學與玄學的迷障與羈縻，把個人從教會與封建體制當中解放，聲言「人乃是絕對唯一的族類」(Fussell, 75)。有關人本主義的討論，詳見 Fussell (1971: 69-76)。就研究、剖析人性的貪怨嗔癡，複雜的人際關係以及人生際遇的顛沛顛仆而言，波普之論點與生命書寫的議題並置亦頗有相當程度的適切性。原詩之原文如下：“Know then thyself, presume not God to scan;/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is Man.” (“Essay on Man” II: 1-2)。

分政界、財經、影視名人等熱中此道，蓋由於其身分、職務跟當前流行之話題、時尚關係較密切，容易引起人們的好奇心或窺視慾 (voyeurism)，回憶錄、自傳的出版經常洛陽紙貴，寫作者也因此名利雙收 (Seidensticker, 1999: 47; Eakin, 2004: 1)。近幾年來，在媒體推波助瀾之下，自白文化頗為流行，大量的傳記、自傳、回憶錄問世，有關生命歷史的敘述蔚為風潮。「在這些發展的刺激之下，批評家乃鑄造新詞，**生命書寫** (*life writing*)，涵蓋當代個人書寫的多變形式，包括訪談、寫照 (profiles)、民族誌、個案研究、日記、網頁等等」(Eakin, 2004: 1)。

隨著新的千禧年的來到，在二十一世紀伊始，自傳、傳記、回憶錄等文體的理論研究開始隨著文學／文化中倫理議題的崛興而備受批評家注意。最典型的例子乃是女性主義者為重新理解、檢證、詮釋古斯朵夫 (George Gusdolf)、勒傑恩 (Philippe Lejeune)、翁尼 (James Olney) 等批評家所提出的自傳文體理論，援用後結構主義的方法論考掘知識的系譜學，從文本的罅隙發掘被壓制的聲音，這些理論的探討與更新，確實有助於深化理解作家／作者於其文本中所銘刻的生命軌跡。這些研究成果匯集為二〇〇四年《現代文學》(*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二十八卷第一期的「自傳與回憶錄專號」(Special Issue: Autobiography and Memoir)，由女性文學批評家羅絲編輯，堪稱為近年來對此議題最深入的討論 (Rose, 2004: v)。此外，有關生命書寫專論的出版，如雨後春筍，皆可資參考。³

³ 新的千禧年左右，有關生命書寫之專論甚夥，老鳳雛鳳競發新聲，各擅勝場。茲按時序臚列部分資料如次：James Olney, *Memory and Narrative: The Weave of Life-Writing* (1998); Suzette A. Henke, *Shattered Subjects: Trauma and Testimony in Women's Life-Writing* (1998); Linda H. Peterson, *Traditions of Victorian Women's Autobiography: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Life Writing* (2001); Lauren Rusk, *The Life*

當前論者對於生命書寫之研究，大致集中於論述主體(discursive subjectivity) 與書寫體製 (genre) 之議題。如同本緒論標題中之「脆弱主體」(“vulnerable subjects”) 一詞所顯示，自傳或傳記中的自我，將個人的隱私、優缺點等特性暴露在閱聽大眾面前，毫無防衛的力量，因此相對地脆弱、易受傷害，或引發爭端：「將我們的生命敘述透過生命書寫的形式，暴露於他人 [面前]，我們不是都成為脆弱主體了嗎？」⁴ 無獨有偶，寇瑟 (G. Thomas Couser) 的書亦以此為書名——《脆弱主體：倫理與生命書寫》(*Vulnerable Subjects: Ethics and Life Writing*) (2004)。根據寇瑟之研究，被再現的客體因為年齡、生理、心理、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處於弱勢地位，與再現的中介者 (mediator) 處於不對等的權力關係，這種感情上的信賴或親密關係，因而使得被再現者處於被動、不利的地位 (xii)。美國「自白詩派」(Confessional Poetry) 詩人賽克斯頓 (Ann Sexton, 1928-1974) 身後出版的書翰集中有不少詩人的自況。在討論這位素以大膽描繪各種禁忌題材著稱，患有精神焦慮症，最終結束自己生命的詩人時，歐慈 (Joyce Carol Oates, 1938-) 評論道：「如果有一種最終、最暴烈的暴露自我的勇氣，以毫無限制、掩飾的藝術呈

Writing of Otherness: Woolf, Baldwin, Kingston, and Winterson (2002); Gunthorunn Gudmundsdottir, *Borderlines: Autobiography and Fiction in Postmodern Life Writing* (2003); G. Thomas Couser, *Vulnerable Subjects: Ethics and Life Writing* (2004); Paul John Eakin, ed., *The Ethics of Life Writing* (2004); Cynthia Huff, *Women's Life Writing and Imagined Communities* (2005); Thomas Larson. *The Memoir and the Memoirist: Reading and Writing Personal Narrative* (2007); Patricia Hampl and Elaine Tyler May, eds., *Tell Me True: Memoir, History, and Writing a Life* (2008).

⁴ 原文如次：“When we expose the narratives of our lives to others through the forms of life writing, do we not all become vulnerable subjects?” (Miller, 2004: 159)。按「脆弱主體」(“vulnerable subjects”) 一詞，係援用女性主義批評家米勒 (Nancy K. Miller) 之概念，批評家以日記條目的方式討論背叛親密關係的倫理問題，又參見“The Ethics of Betrayal: Diary of a Memoirist” (Miller, 2004: 153-158)。

現藝術家自身，那麼安·賽克斯頓就是這個具有高度勇氣的女性」(1983: 183)。

誠然在價值多元化的社會裡，眾聲喧譁，百花齊放，弱勢族裔與主流社會頡頏、周旋、協商的漂泊離散經驗，自然而然吸引閱聽大眾的注意力，自傳、傳記，日記、書翰、回憶錄、遊記等生命書寫的文類，因其再現、遙譯的日常生活的現實與文化現象對於各該社會有其相關性與適切性，因而廣受歡迎也就不足為奇了。對於弱勢族裔鍾情於生命書寫，批評家易荆 (Paul John Eakin) 有精闢的論述：

當吾人述說或書寫我們的生命，故事建立我們的身分認同，既是內容（我是做這些事的人）也是行動（我有故事要說）。我們做某些甚至於更為基本的事情——我們確立自身成為個人：我是有頭有臉的人物，過了很有價值的一生。任何生命故事隱微的訴求皆精確地肯定此一價值，這個故事值得述說與聆聽。(2004: 5)

生命書寫的體製系出多門，概無定則。不管是以第一人稱、自傳式的「我」敘述個人生命歷程的悲歡離合，啼笑因緣，或是以第三人稱說話者 (persona) 的語氣，透過小說、遊記等形式再現人生的衝突、創傷、離散經驗 (diaspora)、戰爭以及生命核心的價值等，皆是令人動容與深思的。作家／作者從個別的生命歷程的視角，呈現分殊的人生經驗與軌跡，並且廣泛地運用多樣的書寫體製，編綴串連起整個時代的圖像。

有鑒於西方學術界此一新的思潮與趨勢，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乃於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以「生命書寫」為主題，舉辦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學者從自傳、傳記、回憶錄、札記、日記、遊記、書信等文類，剖析歐美作家如何於不同的時空中，摹繪與再

現生活現實與生命之軌跡，銘刻與建構自我之身體、記憶、身分認同與政治等相關議題，希望透過理論的探討與文本分析，深入探究「生命書寫」之主題，藉以開展更寬廣的對話與思辯空間。

本專號所輯錄的四篇文章：〈說故事·創新生：析論湯亭亭的《第五和平書》〉，〈血緣／血言：《血之語言》與跨國收養書寫〉，〈「卡洛斯」的美國夢：卜婁杉《美國在心中》的「自我」書寫〉與〈史耐德與生命書寫／詩學〉乃是此次研討會有關亞太區域的跨文化經驗之論文，先行以專號的形式呈現在學術社群之前，嗣後整個文集之出版工作，亦將陸續進行。質言之，此四篇論文所討論的議題皆是在後殖民／後現代的脈絡之下，緊扣弱勢族裔跨國／跨文化的離散經驗以及反思資本主義邏輯所造成的生態廢墟。亞太地區曾經遭逢帝國/殖民主義的侵略與蹂躪，在不同的國家與族裔中，造成或隱或顯的歷史創傷與劫難，透過作家、學者的再現與考掘，燭照幽微，可以加深吾人對這段歷史意涵之理解。要之，每篇論文皆針對特定的作家和文本進行詮釋，有縱深的理論鋪陳與闡述，兼及文本中再現符號、隱喻的解析。前三篇論文的敘述主體分別為華裔美國人與越戰退伍軍人、韓裔美國人、菲裔美國人（皮諾伊 [Pinoy]）／前殖民地人民；最後一篇論文乃是白種美國人反思植基於理性／資本主義的歐洲中心論之侷限與弊病後，轉向美洲原住民、亞洲文化（中國、日本）尋覓另類的解藥。

單德興博士的〈說故事·創新生：析論湯亭亭的《第五和平書》〉一文，係剖析湯亭亭的《第五和平書》(Maxine Hong Kingston, 1940-, *The Fifth Book of Peace*, 2003) 此一「令人不知所措的文本」，如何再現／連結 (represent/articulate) 作家的個人困境與越戰退伍軍人創傷，透過修練與實踐一行禪師 (Thich Nhat Hanh, 1926-) 的「正念禪」(Mindfulness)，山火與兵燹的傷痛與劫難不復

是夢縈魂牽的執念，而是浴火重生之契機。作者剴切指出，湯亭亭的傷悼哀慟，讓她深刻體會越戰退伍軍人歷劫的創傷，並產生感同身受的同理心 (empathy)，此一念之善讓她發揮所長，投入退伍軍人寫作坊，以書寫作為治療、救贖的工具，一方面保持清醒，拒絕失憶 (amnesia)，另一方面，書寫也是表達自我，傳承經驗的不二法門。他們相濡以沫，「以集體的方式來面對並書寫自己的傷慟，反省戰爭與暴力的性質，致力於書寫和平與和平書寫。」禪修和書寫讓各個成員坦然面對自己身心創傷，不再逃避問題，分享彼此的成長經驗，達到集體治療的效果，進而將佛法轉化為社會關懷。透過內省與關照生命的軌跡，「和平之書」原來就是在自己心中不假外求，如同伏爾泰 (Voltaire, 1694-1778; 本名為 François-Marie Arouet) 所言，天堂樂園 (El Dorado) 不在彼岸，而在於勤勞耕耘自己的花園，這與本書筆耕的書寫存活策略，亦屬殊途同歸也！

馮品佳博士的論文〈血緣／血言：《血之語言》與跨國收養書寫〉係研究韓裔美國作家鄭敬娥 (Jane Jeong Trenka, 1954-) 的回憶錄《血之語言》(*The Language of Blood: A Memoir*, 2005)。戰爭離亂是跨國收養的主因，而東西貧富差距所引發的不對等權力關係也在跨國收養的三造之間 (原生家庭、收養家庭與被收養者) 產生緊張與焦慮。作者以「種族性精神分裂」(“racial schizophrenia”) 來描繪因文化差異、齟齬而引起的身心不適症狀，以及收養關係中因尋根而恩斷情絕的痛苦。論文特別指出，如同帝王蝶 (monarch butterfly) 是跨國女性被收養者的象徵，彼等反復往返的遷徙行動 (migration) 而非單向之移居 (emigrate)，可說是全球化人員流動的先聲。蝴蝶羽化飛翔的意象隱喻鄭敬娥之「恨」昇華為寬解與安慰，如同作家以述說／書寫生命歷史的「語言行動」祛除過往的創傷與痛苦。要之，帝王蝶美麗繽紛的色彩正是多元複音的世界璀璨的圖像，揮別

悲情在色彩、重聚、愉悅中憧憬「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而回憶錄拼貼的文體更是典型的後殖民／後現代特徵：「這本以片斷、揉雜文體的形式呈現被收養人的生命經驗的回憶錄，試圖解讀鄭敬娥在跨國收養的脈絡裡如何想像以及再現女性的身體與關係網絡。」作者指出，本書於「散文敘事中，也夾雜混合了童話、傳說、劇本、詩歌、食譜，甚至填字謎遊戲」，也讓批評家感到錯愕。

傅士珍博士的論文〈「卡洛斯」的美國夢：卜婁杉《美國在心中》的「自我」書寫〉乃是探討菲律賓裔美國作家卜婁杉 (Carlos Bulosan, 1911[?]-1956) 的自傳性作品《美國在心中》(*America Is in the Heart: A Personal History* [1943, 1946])。作者指出，「這部作品只有百分之三十是真正卜婁杉的自傳」，其他的組成部分乃是「美國的非裔離散社群」群體經驗與虛構。作者從解構主義的視角，觀察文字再現的過程中所呈現的差異，這個差異乃是來自於個人觀點、立場、文字的再現功能等。自傳的「真實性」是「有條件的真實，有著慾望投射、計畫編纂的痕跡。」作者的研究明晰指出，此文本中的自傳中之「我」字與書寫中之「自我」是一種「辯證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我」與「自我」皆產生若干變化。一方面卡洛斯作為前殖民地的人民歌頌美國理想，嚮往金元王國的「美國夢」；另一方面則透過對於皮諾伊 (Pinoy, 居於美國的菲律賓人之間的暱稱)，移民血淚史的考掘、解讀、註釋，控訴美國殖民政策，暴露美國社會種族歧視之惡行與語言暴力。質言之，卡洛斯所書寫的集體經驗乃是一種「族裔生命書寫」(ethnobiography)：「在反資本剝削與奴役的前提下，卡洛斯在美國的勞工運動是跨族裔的工人聯合陣線，而他與同志們對壓迫的關懷，也不僅止於美國的種族、階級壓迫：……[具有] 世界公民的社會主義視野……。」

蔡振興博士的論文〈史耐德與生命書寫／詩學〉乃是研究美國六〇年代「落拓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 詩人史耐德 (Gary Snyder, 1930-) 如何從中國與日本文化中學習禪及其精神，並將之融入詩中以豐富美國文化之傳統。作者爬梳詩人各個時期之詩作，探勘文明發展與生態均衡的競合關係，以「野性的實踐／修行」(“the practice of the wild”)，重拾美洲原住民文化價值，拈出「深度生態學」(depth ecology) 批判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侵蝕與斷害，其討論對象則聚焦於《石砌馬道與寒山詩》(*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 1965) 與《山水無盡》(*Mountains and Rivers without End*, 1996) 這兩冊詩集。六〇年代各種思潮風起雲湧，「大眾文化、黑人運動、法國女性主義、後結構主義、心理分析等文學思潮正如火如荼地重新展開文化省思的工作，帶來文學研究的新契機」，作為反文化英雄的史耐德所翻譯的詩「實驗性強……『太野了』」幾不見容於學院，顯示出詩人從東方的禪宗 (臨濟宗和曹洞宗) 汲取詩的創作靈感與聲音之努力。本論文闡述詩人以入世佛教的精神從事日常生活的修為與實踐，以對他者／非人 (“the other”/“the non-human”) 之重視消弭人本主義的現代性之弊病，泯滅對立，使「人與自然、整體和片段、主體和客體、立與破、現實與虛構等，均融入拉岡所謂的『小客體』(*objet a*) 迴路中」，也就是佛教所謂的「涅槃」(nirvana) 之境。

綜上所論，本專號的特色，計有下列數點：一、弱勢族裔聲音的再現，文本的題材觸及階級、性別、種族、生態等議題，尤可注意的是性別平等的實踐，特別著重女性之聲音。除了史耐德之外，其他三位作家皆具有少數族裔移民的身分，他們或是二、三代的移民後裔、前殖民地的子民、或被迫遷徙的跨國收養人口。經歷美國種種的社會歧視、磨難之後，彼等轉而重新檢視自身的漂泊離散經

驗，繼承、發明另類的文化傳統，從同化政策與對立政治轉向差異政治，藉此存活策略取得新的發言位置。二、顛覆傳統的書寫方式，開創另類的生命書寫體製。少數族裔書寫重要的特徵之一即為顛覆既有的文類畛域／疆界，因為現行的文化出版機制與產業既然皆掌握在主流派手裡，弱勢族裔只有透過衝撞體制才能突出重圍，另覓生機，否則只是在既定的軌轍中複製文化工業的消費模式。這也就是為何弱勢族裔的生命書寫經常是「令人不知所措的」形式實驗。⁵三、在現今全球化的脈絡之下，亞太地區地緣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力日益重要，檢證／閱讀這些文本中的託喻寓意，適足以作為重新評價美國多元文化 (multiculturalism) 的參證，釐清其與他者 (the Other) 的異質文化齟齬、頹頹、對立、協商，乃至於兼容並蓄的辯證過程。要之，中國、日本、韓國、菲律賓、越南等亞洲文化與佛教的禪宗均對美國文化的再生與復甦發揮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四、不同世代的作家戮力摹繪／再現美國的圖像，鉤陳稽往，拼集不同時空的人物之悲歡離合，蹇促抑鬱。從二次戰後卡洛斯的《美國在心中》(1943, 1946) 到史耐德的《石砌馬道與寒山詩》(1965)，凡二十二年；從史耐德到《第五和平書》(2003) 與《血之

⁵ 「俄國形式主義」(Russian Formalism) 文藝理論家謝克洛夫斯基 (Viktor Shklovsky, 1893-1984) 以「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 之概念，闡明藝術的目的與技巧。在〈藝術作為技巧〉(“Art as Technique”) (1917) 一文中，謝克洛夫斯基指出：「藝術的目的乃是傳授被理解、而非熟知的事物之感覺。藝術的技巧乃是使得客體『不熟悉』，讓形式 [顯得] 困難，增加理解的難度與長度，因為理解之過程即是美學目的本身，必須予與延長。藝術乃是體驗客體的藝術性之方式；客體並不重要。」(“The purpose of art is to impart the sensation of things as they are perceived and not as they are known. The technique of art is to make objects ‘unfamiliar,’ to make forms difficult, to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and length of perception because the process of perception is an aesthetic end in itself and must be prolonged. Art is a way of experiencing the artfulness of an object; the object is not important.”) (Shklovsky: 1965: 12).

語言》(2005) 分別為三十八年與四十載。以二十年為一個世代，這些文本跨越三個世代。作為時代的良知與見證者，作家孜孜矻矻於創作，為多彩繽紛的文化盡一己之力，這豈僅只是偶然？箇中還蘊含薪盡火傳的要旨精奧，這也是書寫生命即景的無窮動力。而史耐德更是自強不息之君子，為生態環境努力逾一甲子，迄至二〇〇七年猶有新作問世——《背負猛火》(*Back on the Fire: Essays*)。

透過詮釋特定時空的文化氛圍，重新省思人本身的歷史、社會、地理與倫理存在狀態，本專號四篇論文檢證以第一人稱的「我」為主體的敘述，或是透過再現策略所呈現的他者的生命書寫，皆饒富時代之意義。⁶ 故此研究不復是傳統「知人論世」的生平實錄或起居注，亦非有聞必錄的編年繫史／紀實，而是以新的理論與方法作為論證工具，檢覈歷來作家如何在作品中展演生命的悲歡離合，銘刻個人、群族乃至整個社會的歷史與文化軌跡，皆為嚴謹詳密之論述，其所隱含之文化批判議題，實值得吾人深思。

⁶ 浩斯 (Craig Howes) 以敘述的觀點研究生命書寫所涵蓋的範疇，認為生命書寫不復侷限於傳統自傳、傳記所表述的生命歷史或經驗的記載，具有更寬廣的彈性，涵納文本中所建構的現實 (2004: 248-250; 李有成, 2007a: 48-52)。另請參考史密斯 (Sidonie Smith) 與華生 (Julia Watson) 以內部、外部敘述觀點區分自傳與傳記之畛域：「人們書寫其生命……同時會從外部與內部觀點為之」(qtd. Howes, 2004: 249)。在〈危機之回憶錄〉(“Memoirs of Crisis”) 一文中，歐慈提到讀者對於傳記文類的期待，是要獲取更多關於傳主身分的事實，但結果可能不盡如此：「理論上，回憶錄的優點是允許讀者立即進入『真實』生活，可免除想像文學的隱喻策略與障礙。最強力的回憶錄可能寫得很漂亮，但美幾乎不是回憶錄的重點。如同羅伯特·勞爾 (Robert Lowell) 著名的評語，『然而為什麼不說發生了啥事呢？』」(Oates, 2005: 229)。顯而易見地，傳記文本中的事實，並不如表面上看來那麼單純，一如小說中所建構的現實，並不能夠等同於實際生活中的現實；易言之，二者對於現實的質疑與爭議如出一轍。亦參見歐慈在〈新式回憶錄〉(“‘New Memoir’: Alice Sebold’s *Lucky*”) 一文中針對生命書寫中精神/心理層面之剖析 (Oates, 2005: 126-130)。

參考文獻

- 文楚安 (譯) (2000)。〈艾倫·金斯伯格簡論——代譯序〉，《金斯伯格詩選》，頁 13-41。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Wen, C.-A. [Trans.] [2000]. A critical approach to Allen Ginsberg—Translator's preface. In *Allen Ginsberg: Selected poems [1947-1997]* [pp. 13-41]. Chen-du, China: Sichu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 李有成 (2007a)。〈鮑爾溫的自傳行爲〉，《踰越：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批評》，頁 45-59。台北：允晨文化。(Lee, Y.-C. [2007a]. James Baldwin'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In *Transgression: Towards a critical study of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p. 45-59]. Taipei: Yun-chen.)
- 李有成 (2007b)。〈開幕詞〉。「生命書寫」研討會，2007 年 10 月 26-27 日。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Lee, Y.-C. [2007b]. Opening remarks on the conference on life writing, October 26-27, 2007, Taipei,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 Couser, G. T. (2004). *Vulnerable subjects: Ethics and life writing*. Ithaca, NY & London, U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Eakin, P. J. (2004). Introduction: Mapping the ethics of life writing. In P. J. Eakin (Ed.), *The ethics of life writing* (pp. 1-16). Ithaca, NY & London, U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ussell, P. (1971). What is "humanism"? In K. Williams (Ed.), *Backgrounds to eigh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pp. 68-94). Scranton, PA: Chandler.
- Howes, C. (2004). Afterword. In P. J. Eakin (Ed.), *The ethics of life writing* (pp. 244-264). Ithaca, NY & London, U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iller, K. N. (2004). The ethics of betrayal: Diary of a memoirist. In P. J. Eakin (Ed.), *The ethics of life writing* (pp. 147-160). Ithaca, NY & London, U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Oates, J. C. (1983). *The profane art: Essays & reviews*. New York, NY: Persea.
- Oates, J. C. (2005). *Uncensored: Views and (re) views*. Hopewell, NJ:

- Ecco.
- Ovid. (1971). *Metamorphoses* (M. M. Innes, Trans.).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 Pope, A. (1951). Essay on man; Epistle II. In W. K. Wimsatt, Jr. (Ed.). *Alexander Pope: Selected poetry and prose* (pp. 138-146). New York, NY: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Rose, E. C. (2004). Editor's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28, 1: v-viii.
- Seidensticker, E. (1999). Autobiography. *Biography*, 22, 1: 46-56.
- Shakespeare, W. (1961). *The tempest*. In G. B. Harrison (Ed.), *Shakespeare: The complete works* (pp. 1471-1501).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 Co.
- Shklovsky, V. (1965). *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 Four essays* (L.T. Lemon & M. J. Reis, Trans.).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